

武侯墓价值初探

张东

武侯墓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墓葬所在地。它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城南五公里的定军山下。一九五七年，武侯墓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九六年，武侯墓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概述

公元 234 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与魏司马懿对垒于渭原，秋八月病卒于五丈原军中，“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墓前有土冈三层，自定军山叠浪而来，形如眠弓，因名“三台书案”。墓后有笔锋山，形如新月。笔锋山与书案梁之间平旷三百余亩，林深枝茂，其参天挺拔者为古柏，约数百株，径在一米以上者原有五十四株，喻诸葛亮在生之年，现存二十二株。更有汉柏、汉桂等古树。

墓前有庙，墓、庙在一中轴线上，呈东北向。墓庙始建于蜀汉景耀六年（263）春，历代屡加修葺，规模较大者数唐、明、清三朝和当代。墓庙是一座三院并联的围垣大院，有房舍六十余间，庙门前有字库、萧墙、（照壁）、小溪、拱桥、乐楼、土地庙，笔峰山上有“万古云背”堂。

山门上方镶嵌“武侯墓”匾额，进山门为四合院，与山门相对为献殿、大殿。殿前有合抱古柏，盘以凌霄藤蔓，人称“爬柏凌霄”，藤蔓绕柏而上，高出树梢，垂其枝条，春始发叶，夏至开花，花期月

余，红艳如火，宛如千年古柏开花。殿前古钟及殿内香鼎系大清同治13年（1874）所铸，铁质。古钟重约千余斤，上铸“武侯钟神”及吉语“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捐铸者姓名。

大殿高大宏敞，画栋雕甍，正中高悬“万古云霄”匾额。殿内有造像五尊，系明代万历年间所塑。神龛上，诸葛亮端坐中央，手持六韬书卷，几绺胡须飘洒胸前，目光集中，神态安然，仿佛正运筹帷幄，令人肃然起敬。琴、书二童分站两侧，一捧印，一持剑。龛下张苞、关兴侍立左右，威武雄壮，器宇轩昂。

殿后大冢为诸葛亮之墓，冢高六米，周长六十四米，呈覆斗型，四周为八卦型大理石围栏。墓前有坟亭，竖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陕西按察使赵健和清雍正十三年（1735）果亲王所立墓碑。坟亭为四角攒尖式，上方悬“双桂流芬”匾额。墓后有寝殿，亦称崇圣祠，供奉者历朝历代的封位牌，在寝殿与墓冢之间有汉桂二株，对称互生，谓“护墓双汉桂”，高十九米，径一米左右，冠幅二十五米，浓荫蔽墓，仲秋花盛，溢香十里。色橙，花有五至六瓣的，最多可达八瓣，实属稀世罕见。

墓西南又有一墓，前有坟亭三间，亭内竖“汉丞相诸葛武侯之真墓”墓碑一通，为民国五年立。据考，此墓系清嘉庆四年（1799）11月，陕甘总督松筠根据风水先生谭南宫的推断而建。这就产生了两个墓冢并存的现象，但一般认为殿后大冢为真。

墓庙内碑石、匾联甚多，除损坏遗失外，现存石碑三十二通，皆为前人咏叹和历代翻修墓庙的题记。古匾额三十三块，对联十八付，或赞颂，或惋惜，或评价，为墓庙增添了丰富的文化与配景。

墓庙区内多古柏，相传喻诸葛亮再生之年的五十四株古柏均在此区，现存二十二株，大都围绕墓冢所植，成行成排，穿插庙中，布局严谨，其中有一人合围者，据 C14 鉴定为汉晋所植，这些古柏的存在，也为武侯墓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见证，墓庙区还有唐、宋、元、明、清各朝所植古柏百余株，有观赏价值的花木和植物也多在此区内。

柏树坪在庙东南约五十米处，面积约十余亩，此区内全是明清古柏，绝无杂树，约有一百多株，大者一人围，小者径约二三十公分，挺拔直上，互相轩邈，郁郁苍苍，甚为壮观。

庙北有地六亩四分一厘（俗称八亩地）。地周多古柏，据推测，为唐、宋时植，笔挺苍劲，枝繁叶茂，构成墓庙北区外围景观。

笔峰山在庙后，峰峦起伏，状若游龙，主要树木为青，相传为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武侯墓办校时所植，有数万株，四季变化，争为奇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又植马尾松数万株，现已成林，欣欣向荣。

庙前数米有小溪，溪边多槐柳，每年五月，槐花芬芳，蜂蝶扑塑，如玉带、哈达，敬献忠魂。缘溪古树，盘根错节，与溪水回影流闪，更有一番意趣。

书案梁在庙前五十米处，有青树千余株，古黄连树二十余株。黄连树树杆粗壮奇伟，典雅而清秀，杆枯而叶嫩，每逢金秋，火树银杉，红、黄、蓝、绿，争相斗艳。

二、军山苍苍，沔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便问定军山”定军山在武侯墓东侧，与武侯墓襟连，是著名的古战场，公元 219 年刘备与曹操的汉中争夺战中，蜀汉老将黄忠刀劈夏侯渊于此，南宋吴玠、刘子羽抗金南侵，在此镇守。定军山更因武侯墓的存在而享誉海内外。

定军山属巴山支脉，其脉自金华山来，“峙立千仞，状如笔然”，平地凸起秀峰十二，汉水灌其足，漾水抚其背。植被丰茂，怪石嵌然。按山脉走向，自西向东依次排列为：石山、大山、定军山、中山、小陡山、八阵山、一字山、卧牛山、鸡心山、黄猫山、元山、当口寺山，此十二峰连延二十余里，峰峦起伏，宛如游龙，号称“十二连珠”峰。石山半腰突起一石壁，高 3 米多，宽 2 米许，中开一缝，宽窄不一，有一箭矢，摇之能动，拔之不出（现无），相传为诸葛亮当年操兵演武时用以遮挡敌箭的“遮箭牌”。山南有清流萦带的漾家河，可屯万兵的“仰天洼”。山北沃野平旷，陇亩严畴，村舍俨然，为当年诸葛亮布“八阵图”之武侯坪。

沔水即汉江流经勉县段，从定军山北滚滚东去。勉县（原名沔县，古称沔阳县）之名即以沔水之阳而得名，曹、刘汉中争夺战，赵云据沔水背水结营，大破曹军于此。

诸葛亮“葬汉中定军山”与大汉王朝、汉民族、汉文化的水乳交融的意义是何等的深刻。他安卧于此，与这源远东去的汉江水，巍峨屹立的定军山而千古不朽，万世永存。

三、武侯墓在当时即体现出特殊的价值

“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私祭之于道陌上”，鉴于此种情况，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上疏，要求官方给予立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在公元263年“诏为亮立庙于沔阳”，就在同一年，魏镇西将军钟会伐蜀，途径汉中，祭亮之墓。《三国演义》第一百十六回《钟会分兵汉中道，武侯显圣定军山》中有一段精彩的描绘，可谓神来之笔。大意是钟会兵临定军山附近被阴兵杀退，夜梦“纶巾羽扇，身衣鹤氅，素履皂绦，面如冠玉，唇若抹朱，眉清目朗，身長八尺，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的诸葛亮，劝诫钟会勿妄杀蜀民，钟会觉醒等等。这一段情景的描绘，把诸葛亮过于神化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诸葛亮忠心事刘，所谓“生为兴刘，死犹护蜀”，其可褒、可嘉，使敌国也钦佩之至。

而事实上，“魏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从民间私祀至官方公祭，从国人怀念至敌国拜祭，说明诸葛亮的品格，诸葛亮的才干，诸葛亮的功德为世人所公认，他不仅是蜀汉国的宰相，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连他的敌人司马懿也赞叹曰：“天下奇才也”，从这一点出发，在当时能够使敌、我双方共同赞拜的灵魂是否已经超越了蜀汉丞相的界定意义。

四、斯地埋忠骨，寓意何其长

公元 227 年，诸葛亮上《出师表》，辞别后主，驻扎汉中，组织了五次伐魏战争，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五丈原，安眠定军山。自“隆中对策”以来，辅佐刘备，在纷繁杂乱的军阀混战的局势下，策划了三分鼎立的局面。

诸葛亮出山至仙逝，可分为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帮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这个时期他的政治、军事及治国才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首先他以敏锐的洞察力确信荆、益二州能够归刘氏所有。在曹操大军压境，刘备败逃的危难时刻，出使东吴，协助孙、刘联盟，参与组织和实施了赤壁战役，并且为巩固荆楚根据地，操持后勤，尽职尽责。而在刘备取蜀损兵折将的关键时刻，（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沂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占据了荆、益即实现了“隆中对策”的前半部分，在其政治路线和军事斗争方面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治蜀时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刘备外出，包括取汉中，“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保障了前线军事斗争的后勤供应。

从上《出师表》到秋风五丈原的八年时间里，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活动地域是汉中，主要政绩也留在了汉中。

那么，长期驻军汉中，并遗命葬汉中定军山的意义何在呢？

1、兴复汉室蓝图中的钳击计划的破灭与形势的逆转。“隆中对策”中描绘了在取得荆、益之后，两路出击以取东、西二都，使曹魏分兵二顾，若有一路取得重大胜利，蜀汉就有在中原与曹魏抗衡的基

础，进而进行统一中原的战争。然“天下有变”却变得极其不利于刘蜀政权，原来有利的局势急转直下而使得蜀汉政权面临“危急存亡之秋”了。首先是荆州失守，继而是虢亭之败，接着先帝崩殂，这样以来，东线出击则是与国的事，蜀汉只剩下出秦川这条唯一的出路。因此，驻军汉中则成为必然。这就是说，蜀汉的命运与汉中的战略与地理位置决定了他必须这样做。

2、矛盾的心理因素迫使他长期驻守汉中。诸葛亮决定出师北伐，临发，给后主刘禅上了《出师表》，“临表涕零”，非是惜别后主，实是追念先帝，先帝“三顾”而出山，与之夺荆州，取西川，政权从无到有，地盘从小到大，而今蜀止剩一州之地，缺乏将帅，也只能以身代劳，“廉竭弩钝”了。而另一方面，在与先主共事的时日，也常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存在，比如：在袭取荆州问题上，在东征孙吴问题上，在用人问题上，矛盾与情感的交织，最终是情感战胜了矛盾，从“鱼之有水”到白帝托孤，正是最好的说明。而与后主的关系则不同，这一点从《出师表》中可以清楚地得到一些启示，内忧外患的严重性已经使本政权到了“危急存亡”的严峻时刻，至于内部矛盾业已点名，明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大政方针，而外部矛盾则是主要矛盾，在应对外部矛盾的同时，也可以避开或淡化一些内部矛盾。

3、“汉中”是蜀汉政权的生命线。汉川在秦、巴之间，绵延千里的秦岭大山脉，横亘于汉川之北，是汉中的天然屏障。公元215年，曹操征张鲁，“既至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便自引归”。后在刘

晔的劝导下才征降了张鲁，取得了汉中。公元 219 年，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曹操在损兵折将的情况下，决定放弃汉中，以“鸡肋”喻汉中。就在曹操认为可有可无的地方却是蜀汉王朝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保住了汉中就保住了蜀汉政权，这也就是蜀与汉中的联结意义。

4、加强汉中防御是延缓蜀汉政权衰亡的最好办法，也是驻军汉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后出师表》中列举了六点不解，对蜀汉政权统一中原的最初构想产生了质疑。从《隆中对》到《出师表》，再到《后出师表》，也就可以理解刘蜀政权由兴到将衰的进程，只有加强汉中的防御体系建设，使强大的魏国不能小觑蜀汉，这就是加强汉中防御的意义。

5、北伐曹魏是积极防御的重要举措。在《出师表》中讲的是一种进攻的战略，诸葛亮尽心尽力地组织了五次北伐战争，双方互有损失，其中第一次我方出师不利，损失惨重，第五次，将星陨落，悲风萧萧。第一次北伐失利的经验告诉他，进攻中的防御是重中之重，由于重视了这一方面，因此，在后来的几次出击中虽未有尺寸土地的拓展，然不至于大败，也无覆军之虞。秋风五丈原后，蜀军退，司马宣王案行其营垒曰：“天下奇才也！”正是说明了蜀军完备的防御体系使之惊诧不已，使之不敢轻易攻蜀。诸葛亮生前在岐山军中曾对魏延等说：“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就是说，他早就意识到恢复中原的可能性是渺茫的，而加强防御就能延缓蜀汉灭亡的进程。诸葛亮在汉中发动了五次伐魏战争，实质上为蜀汉政权训练了一支保安队伍，这支队伍在他死后的三十年里，是保卫蜀汉政权的坚强柱石。

蒋琬、费祎主政时期，闭关自守，也常驻汉中，加强防御。蜀汉后期，姜维九伐中原，基本上奉行了以攻为守的军事路线，终因朝纲不振，国力衰竭而亡国。

6、诸葛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的目的和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也是颇费心思的一个问题。在三国鼎立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蜀汉国存在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笔者认为不可孤立地、简单地用未达目的、死犹护蜀、逼近宗庙等等来下结论，当然，上述观点确是葬汉的重要原因，但更应客观地、历史地、联系地、辩证地来把握这位先哲的抉择。

汉中既是蜀汉北伐战争的前沿基地，又是蜀汉政权的保障营垒。经营汉中是蜀汉政权得以巩固的基础，建设汉中、保卫汉中，以汉中为家并安息汉中之是其心愿，也是对蜀汉政权的忠心回报，并告诫后人，强调了汉中之于蜀汉政权的重要性。

以汉中为根据地，多方经营，休士劝农，军垦军屯，发展生产，养精蓄锐，损益连弩，推演阵法，造木牛流马，设围守，筑汉、乐城，教兵演武，整肃行阵，驻汉八年来的心血倾注，成果展示，与汉中感情基础深厚，也是葬汉的重要因素。长期驻军汉中与京都主宰的关系也与葬汉有着一定的关系。

五、保护利用与发展价值

“定军山前寒食路，至今人祀丞相墓”。蜀汉政权是短暂的，诸葛亮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却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晋朝封其为“武兴王”，唐朝封其为“武宁王”，宋朝封其为“忠惠仁济显应王”……。人民的赞、惋、哀、叹、崇、拜、祀、奠从未间断，历

代文人骚客也留下了名仰万世的不朽之句。如桓温、李白、杜甫、李商隐、苏轼、王安石、陆游、宋祁、朱熹、王士禛、王世正、郑板桥、完颜崇实、张演、额勒德礼、顾炎武、陶铸等。其中亲谒亮墓与定军山，并留下千古遗诗者颇多，如陆游、宋祁、张演、吴澄、额勒德礼、薛瑄、樊克己、王士禛、王世正、阎尔梅、魏际瑞、崔龙见、吴天府、赵翼等，枚不胜数。武侯墓不但在当时就体现了价值，而且经历朝历代保护与建设，可以说它是汉中文物古迹中最具魅力的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利用这笔财富。对此，笔者发表几点浅显的看法。

1、业务队伍素质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武侯墓自设立专门保护机构以来，业务队伍不断壮大与发展。武侯墓的一些成就不但体现在科学的保护文化遗产方面，而且表现在内容的充实，不断展出最新科研成果与宣传报道等诸多方面。武侯墓举办过定军山之战展览，勉县出土文物展览，诸葛亮生平事迹展览，名人字画展览，立体模拟展览，泥塑诸葛亮在汉中等，恢复了一些匾额、对联，雕刻了岳飞书写的《出师表》等。

在建设方面，根据自然地形修建了大围墙，肯定了有效保护范围。翻修了所有古建筑，使之焕然，增建了旅游服务部等，地方政府还修建了从县城至风景区的二级公路，使旅游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旅游六大要素中的“行、游、购”三要素有了初步的基础。

然而人才战略的实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也是文物管理工作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武侯墓目前的情况看，业务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业务队伍当中的文化层次结构不尽合理。在个人素质上也有

佼佼者，有多人次介入全国诸葛亮学术讨论的，有出席过“北京世妇会”的，有发表过多篇作品的，有参与规划报告的。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重要的方面是人和人才队伍的建设。人的思维形态，思维观念，制约着发展的需求，这就是说，行当里手应在高明的组织者的指导下，才能发出其应有的光和热，才能为事业做出更好的贡献，才能从内在的动力方面推进事业向高层次方向发展，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思维的主体。

2、文化研究，古为今用

武侯墓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如“卧龙”安卧斯地问题，“二龙戏珠”、“九龙捧圣”等龙的象征意义问题，武侯墓的价值评价问题，武侯墓诗词匾联的文化内涵问题等等。

武侯墓有一名联曰：“故国不归山河未遂中原志；忠魂犹在道路争瞻汉相坟”中的“故国不归”应为没有达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的，应与《隆中对》和《出师表》的思想内容联系起来解释。“故国不归”可理解为东、西二都未能回到以大汉王朝继承者自居的蜀汉政权手中，这和他的“隆中对策”是相对应的，决不可望文生义，狭隘地说，他死后不归葬于国都（成都），或没有能力安葬于老家山东而遗憾。因此，在这些不该出差错的地方出了差错，就成了笑话，不但游客不满意，而且会对武侯墓造成负面影响。文物旅游不能仅仅利用历史遗存的外形，应以其内涵与外延的协调发展而为古今用。认真研究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化内容的深刻含义，做到较为科学合理的解释，

突出其宣传、教育的正面作用，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才能在文化旅游方面收到较好的效果。

3、保护遗产与经济协调一致

文物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不可再生性。武侯墓已存在了一千七百多年，它同国家其他文物景点一样，都显著地保留着历史的信息。自季汉以来，各朝代的遗迹均有，最鲜明的东西就是古树，这些活着的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武侯墓有一付对联曰：“数亩疏筠山光犹拟南阳卧；几林翠柏鹃血常啼蜀道难”，“几林翠柏”仍在，“数亩疏筠”却无，这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尚在的“数亩疏筠”跑到哪里去了呢？在“几林翠柏”掩映下的“数亩疏筠”并不起眼，也未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而有些开发进程就使得人们茫然了，愣怔了。许多古树名木消失了，许多地形地貌变化了。一些半土不洋、不伦不类的建筑出现了，一些怪模怪样的情况发生了。

可喜的是 2001 年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发出《关于禁止擅自改变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的通知》已经明确地否定了这类开发行径，可望在短期内能够恢复到“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正确轨道上来。

在以文物为依托的文物旅游景点，首先是保护好历史文化遗存。特别是武侯墓，不但具有一般文物点的历史、科学、文化价值，同时还具有诸葛亮文化的思想价值及其三国文化旅游的特定内涵。在旅游六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中，景点应是“游”的范畴，是目的性旅游的终极要素，景点的价值是决定旅游其它五要素价值体

现的最关键因素。文物景点的价值是由诸多历史文化信息和自然环境面貌所构成的，它的文化内涵的广度和深度决定其价值的大小。如果以开放、搞活、引进为幌子，支离破碎之见为依托，新教条主义为准则，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个人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破坏性开采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武侯墓的悲剧就为时不远了。

因此，张延皓同志讲：“文物资源经济功能的发展应坚持三个前提：（1）文物不受破坏；（2）文物的权属不受破坏；（3）文物的公益性质不受破坏。”在上述前提条件下，如何面对市场，发挥文物古迹在旅游活动中应有的经济效益，这就要求我们要建立一支思想过硬、素质高、业务强的文博专业队伍。加强研究，强化基础，把保护、利用、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一致，既有所为而无所为，该发展的，一定有努力开掘，不该开采的必须坚决禁止。业务研究能力不足，可从同类部门中请专家、学者，相互切磋来弥补，决不能夜郎自大，目中无人，更不能因眼前的微小经济利益来搞违背国家法令的事。

文物古迹的文化、教育、历史、娱乐、科研等作用的发挥，不能简单地以暂时门票的收入多少来衡量，它的价值在于它本身的存在。保护就是发展的基础，武侯墓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与自然环境面貌，是发展文物旅游的源泉动力。努力搞好宣传，提高其知名度，加强管理手段，展示科研成果，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在保护好现有遗存的前提下，搞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行业，合理利用资源，搞好规划及实施，因地制宜，探索出发展新途径，找准自己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维中的位置。

4、科学规划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

武侯墓的现实运行情况表明：（1）、在改革开放、西部开发大形势推动下，旅游观光的人流、品位呈明显上升趋势；（2）、随着三国文化的升温，其知名度与地位不断提高；（3）、交通和服务设施有所改善；（4）文化内涵有所增强；（5）、技术资料基本规范化。这是积极的一个方面，是编制规划的基本依据。而滞后的情况有：（1）、地形地貌利用率差；（2）、服务配套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3）、管理和经营策略尚待改观；（4）、不协调建筑对名胜风景的影响；（5）、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其他不协调因素。

基于上述情况，武侯墓在新形势下的科学规划迫在眉睫，武侯墓保护区是在一个自然的低洼地形当中，约 24 万平方米。无论书案梁与笔峰山都是洼地的隆起部分，这是其地形的丰富性因素，如果规划的好，其资源利用无可限量。

沿勉武公路向南，过公路、铁路立交桥即可望见森森密林，此即武侯墓景区。过桥前行百米即定军山与武侯墓交叉道口，在此建一牌楼。再行百米就到了武侯墓景区，在高、低自然地形交接处修建外山门，外山门左侧征地十五至二十亩建停车场，在牌楼与外山门之间建仿古居民区，这是武侯墓外围景区。外景区的建设对古迹区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与利用价值。

外山门与内山门、墓冢应在一纵轴线上，拾级而下，越书案梁至小溪前。在书案梁上建书案亭并向书案梁两边延伸走廊，至尽头建六角亭。

墓庙北偏西的适当位置，应恢复“数亩疏筠”，即植楠竹数亩（此区无景）给游客以休息、小憩之地，达到扩大旅游内容与时效的目的。

在笔峰山上随地形起伏建游廊，使之曲折延伸，并配以中小凉亭，使游人在茂密的林丛中休闲小憩。

在墓庙东南二十余亩耕作区布局“八阵图”，此说不无依据，《忠武祠墓志》载清李复心道人欲在沔县武侯祠左右征地十余亩布局“八阵图”，其愿未偿，然高坪故垒现实地不可能实现，而在武侯墓景区闲置土地上增添古老而颇具研究和旅游价值的东西，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现代旅游都具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并对后世产生影响。

墓庙西北八亩地，1982年回收后，一直闲置，荒草丛生，未发挥游览价值（现种了一些树），因其近庙，应开辟为有仿古建筑的展览区，其可展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例如诸葛亮丰功伟绩展、诸葛亮文化研究成果展、名人字画展、历代文人骚客评价诸葛亮的诗词、文章，蜀汉遗迹缩影等。可多样性、多方位、多角度地把诸葛亮纪念地，蜀汉遗迹等清楚地、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民众面前。使游览观光者不虚此行，到武侯墓不觉单调，又能给游客指引三国蜀汉旅游的去向，还能大大提高旅游时效及经济效益。

六、正确发挥武侯墓在文化强市中的作用，真正体现武侯墓的价值

武侯墓目前已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迎来了特别发展机遇。一是西部大开发的高潮已经到来；二是改革开放，经济活跃；三是新的

《文物保护法》的颁布施行；四是文物保护级别的提高；五是地方政府的重视；六是京昆高速公路西成段的开通和十天高速公路与西成铁路客运专线的启动；七是三国文化旅游的升温，八是西三角经济圈构架的形成，这些有利的情况可使经济效益逐年攀升。有了这诸多的有利因素，其大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

那么，武侯墓在机遇面前，应采取什么策略呢？

1、首先，就是要树立起科学发展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结合实际，制定一套既能统筹兼顾，又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纲要。加强业务学习，提高干部职工的业务素质，按照各自的特点来使用人才。这样，就会增进团结，增强凝聚力，就会反对落后、愚昧和无知。

2、加强法制观念。《文物保护法》是盾牌，是文物得以保护的最有效文件，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文物保护法》，是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的负责，是“有效保护”的保障。

3、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基础研究。文物景点，既是保护部门，又是研究单位，还是旅游资源。文物景点价值的体现，是靠不断的新科研成果来推进的。清朝沔县武侯祠住持道人李复心写了一部《忠武祠墓志》，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其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是相当巨大的，而我们今天的研究成果又有可能对后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武侯墓在过去的研究中出了一些成果，推动了事业的发展。但研究队伍的现实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后继乏人的现象极为突出，甚至出现了断代的危机。

4、加强管理，是文物旅游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所谓管理，是一种人为的对某项事业或事务行使的职权或规范。其职权的行使或规范的建立是否科学，没有准确的界定标准，如果使事业以较高的速度持续发展，就是较为科学的，如果使事业徘徊不前，就是较为不科学的，如果使事业受到严重损害，就是极为不科学的。

5、把武侯墓推向世界文化遗产之林。武侯墓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升级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其历史遗存的价值被确认的结果，包括墓葬、建筑、建筑特点、人文景观、文化内涵、自然环境、保护范围、古树名木等等，体现着历史、艺术、科学三大价值。而武侯墓的潜在价值尚未发挥出来，文化理论研究尚未上档次、上规模，研讨和宣传工作尚属初级阶段，规划尚未实际，论证尚不得力，封闭性的小农经济思想尚未打破。

武侯墓的知名度和价值，是诸葛亮文化传播价值的体现，诸葛亮文化价值在国内已是享誉很高的，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升值之中，诸葛亮的思想和智慧广泛地应用于行政、商业、外交等诸多方面，诸葛亮思想的研究已趋于国际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交通环境和旅游基础设施的改善，旅游经济效益及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使得诸葛亮文化传播范围的扩大是必然的。一个方面在于“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效果；另一方面就是它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正确体现，即：诸葛亮文化与武侯墓文化价值的研究在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就是武侯墓能否立于世界文化遗产之林的界定标准。

张东：陕西省勉县马超墓文管所文史专家

（《天汉》杂志，姚璞主编，陕西省弘扬汉文化研究中心·汉中市汉文化研究协会主办，第十五期，第 23-28 页）